

后浪

# 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

钱穆

讲授 叶龙记录整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

钱穆 讲授  
叶龙 记录整理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 / 钱穆著 ; 叶龙记录整理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6.3

ISBN 978-7-5502-6858-6

I . ①中… II . ①钱… ②叶… III . ①中国经济史 IV .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2235号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

著 者: 钱 穆

记录整理: 叶 龙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特约编辑: 陈顺先

责任编辑: 王 巍

封面设计: 周伟伟

版面设计: 李红梅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99千字 690毫米×960毫米 1/16 8印张 插页4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6858-6

定价: 29.80元

---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 序

余在新亚书院就读期间，曾修读钱穆老师所讲授的六门课程。在研究所时之两课不计，计有1953年的“中国经济史”和“中国通史”，1954年的“庄子”和“中国文化史”，1955年的“中国文学史”和1956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一共六门课。其中除了“庄子”以外，都是史，除了“通史”，其他都是专门史。

现在于2014年自北京后浪出版公司已将《中国经济史》出版数以万册计，同年于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繁体字本，销路亦不俗。于是遂有国内新华书局来签约出版《中国文学史》，2015年夏已由余对稿毕，下半年将可出版简体字本。至于繁体字本，香港商务印书馆正在装订中，将可在本年四月率先出版。现余又将钱师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整理完毕，去岁由商务副总毛永波先生偕同后浪吴兴元总经理来舍下访余，见余正整理此稿，遂要求由彼二家出版此书，本年四月初已可交稿排印矣。由于《文学史》在今年已出版，故如今年内未及出版，明年将可出版。钱师曾言：“穆意大陆终为今日，吾等在港者一归宿之所，此事已在前年与弟及新亚同人谈及，盼能常存心怀，并在学业上好作准备，先忧后乐，书生报国，惟在此。弟此行感触，即是做学问一大方向，如何转移风气人心，乃属学人大责任所在，千事勿忽。穆虽老，亦当追随努力也。”（此段钱师所言，乃其致唐端正学长一函中之一节，语见香港中文大学新亚

书院出版之《钱穆先生书信集》)照钱师此函所言,钱师与其弟子辈均应负此责任,即是让吾等先做好学问,以备将来将学识传往内地,以作转移风气人心之用。今吾将钱师讲授各课逐本传入大陆,由后浪、新华诸书店刊印发行全国,且余又撰写多篇万字长文刊登于《深圳商报》,以介绍钱师所著上述各书稿之内容。凡此种种,亦即符合钱师生前期望。钱师若泉下有知,亦必内心感慰无已也。

今余手头尚有钱师所讲“中国通史”笔记稿一册,及未及找到之“中国文化史”稿本,二稿如能接续整理出版,则乃人生大快事也。

再说,余整理钱师“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不及两周已完成,此乃因钱师当年所讲,出口成章,故使余整理费时不多。由于原稿写于一甲子前,墨水褪色已淡,余又年近米寿,得赖放大镜看清字迹,遇有潦草褪色之字,得用两镜重叠,始能照明看清。惟全稿仍有整句未能查明之处,只得割爱舍弃。且余当年缺“漕运”一堂之讲课,此亦无可奈何之事也。一切唯有顺其自然,望读者谅之。自信记录差可准确,但难免有所疏误,再次恳请各界恕宥为感。

是为序。

叶龙

2015年4月4日

于香港青衣寓庐

# 目 录

序.....	叶 龙 1
绪论 .....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氏族社会与农业概况 .....	5
一、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 5	
二、古人居住于高处山地考 7	
三、古人住在山上 12	
四、氏与族之分别 13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	15
一、西周封建政治下的宗法社会 16	
二、西周的井田制度 18	
三、井田制度破坏后的“履亩而税” 20	
第三章 春秋与战国时期的土地与工商业.....	25
一、土地的耕地与非耕地 25	
二、战国时期大城市的兴起 26	
三、齐国的工商业 28	

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四民社会·····	31
第五章 汉代之经济情况·····	35
一、汉代轻徭薄赋	35
二、汉代之经济政策	36
三、汉代之读书人——士	38
四、汉代以下之士族	40
第六章 魏晋时期的门第社会·····	45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制度·····	51
一、魏晋的屯田制	51
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52
三、北朝的三长制	54
四、晋朝与北朝的兵制	55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的传入·····	57
第九章 中古时期之中国城市·····	59
一、中国城市之特征	59
二、中国的四个大城市	60
三、中国社会的共同特点	63
四、汉唐的郎吏社会和科举社会	64
第十章 中国的海内外交通和贸易·····	65
一、从南北朝到隋唐的海外交通	65
二、唐代的海外贸易	67

三、唐代的市舶使和贸易港	69
四、唐代的商业	70
五、唐代的驿站	71
六、唐代之交通运输	73
<b>第十一章 唐代开始之科举社会</b>	<b>75</b>
一、唐代科举社会之特征	75
二、宋代近代社会之特征	76
三、宋后中国农村新体貌	77
四、唐宋明之考试制度	78
<b>第十二章 宋代兴起之新制度</b>	<b>81</b>
一、宋代之书院制	81
二、宋代之社会制度	83
三、宋代之遗产处理	83
四、宋代之保甲制度与乡约	84
<b>第十三章 元代统治状况</b>	<b>85</b>
<b>第十四章 明代经济情况</b>	<b>87</b>
一、明代南北经济情况之转变	87
二、宋元明时黄河与运河情况	88
<b>第十五章 宋元明三代之民间手工业</b>	<b>91</b>
一、唐代以来的丝绢纺织业	91
二、元明时期的棉织业	92
三、宋明的陶瓷业	93



四、唐宋的雕版印刷术	94
五、唐宋的造纸业	96
六、宋代的钞票发行	96
七、元明时期的匠人	97
<b>第十六章 宋后之市场形式</b>	<b>99</b>
<b>第十七章 从井田制到唐代赋税制</b>	<b>103</b>
<b>第十八章 宋代之“飞洒”与明代之税制</b>	<b>107</b>
一、宋之“飞洒”与明之黄册、鱼鳞册	107
二、明代之一条鞭法	109
<b>第十九章 清代社会经济情况</b>	<b>111</b>
一、清代之地丁合一税	111
二、清代之消亡	112
附：民国时代之赋税	113
出版后记	115

## 绪 论

这一回承蒙史博人、沈仲章、曹廷爵、刘乃人诸君会幸，不但只是看百年之史而已。后来才知道经济条件社会等时，并不像所想象，那到底还不知有连累关系。

本书与政治的关联，在行分场，所谓“结构主义”（即是“经济决定”），他们强调由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并由社会形态来决定一切历史，这是社会的分毫。中国人讲历史化较有系统，是据朝代来讲，西方人讲历史则按地域，只分为北方、中古及南方来讲。如维多威那/经济史家们多按地域来讲，按社会与阶级，则按文化性来讲。如李波又是按社会、阶级以及社会阶级来讲，这书与他的“结构主义”有异，因此对东方历史来说，既不能按如此分法来讲，西方人讲历史讲述并不是照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类历史的演进，有文化性的表现，每一个文化性，对各个不同的民族来说，都有其文化性，这要据其文化来讲。中国人的历史演进，欧洲人的，非洲人的历史演进，美洲各民族的演进可以互通，才可以看出他们有不同的文化。

今天讲那经济，那政治的关联，直都讲得有声有色。此点为历史各国家不改。今天真是各国家都要用其历史来解释不是的讨论，这真非非经济学不表。

今天要用政治制度来解释来解决问提，却解决不了，因此西方人讲那经济讲到那政治制度不今天，只是那政治制度讲了



向来学历史的人，比较不注意社会和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也不过只是两百年之久而已。后来开始讲经济学和社会学时，并不牵涉历史，要到后来才知有连带关系。

社会与经济两者可合讲，亦可分讲。所谓“唯物史观”，即是“经济史观”，他们认为由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再由社会形态来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中国人讲历史比较有系统，是按朝代来讲，西方人讲历史则较紊乱，只分为上古、中古及近古来讲。由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学者来分期的话，则按社会与经济，封建主义是农业，资本主义是商业，共产主义社会仍是工商业。这样分法，可以说部分是对的，但是对东方历史来说，则不能按如此分法来讲，因为人类历史演进并不是照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历史的演进，有无共同的轨道，是一个大问题，对各个不同的民族来说，意义极为重大，这要用归纳法来讲。中国人的历史演进，欧洲人的、回教人民的历史演进，须将各民族的历史演进加以汇通，才可以看出是否有共同轨道。

今天讲理论的，苏联讲的有错，但却讲得有声有色，此点为英美各国所不及。今天英美各国如果想要用真理来驳倒苏联的理论，这就得要献身于真理。

今天要用政治或宗教等来解决问题，却解决不了，因此西方人就渐渐注意到东方的历史了。今天，中共推行的政策较倾向于

苏联，力量很大，大陆青年须学习唯物史观，影响很大，因其政府想用唯物史观来讲通中国历史。

最近，法国巴黎正在召开汉学家会议，讨论中国历史如何分期。今日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历史都不完整，唯有中国的历史，才可以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如何演进。这便是今日欧美已注意到的文化问题。

从前的西方人，总认为不信上帝的民族是不开化的，但今日他们已改变这种错误观点（钱穆先生讲此课程时是1956年9月）。今日来谈这问题，仍是一个智识的、历史的问题，这是时代的要求，是书上没有的新智识。

大陆有一套根据历史的大理论，因此看不起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职业性的小问题。将来对世界学术有大贡献的，最好还是研究中国历史。

今日世界人类已经觉醒，自己各有一套文化，不愿佩服他人的。

今日我们来讲世界人类历史共同演进的方法，就要用历史的、科学的归纳法。

# 第一章

## 中国古代的氏族社会与农业概况

### 一、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

最古的中国社会并非原始共产社会，而应称为“氏族社会”。中国古代的经济以农业为始，世界各国文化的开始都是如此。

所谓“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及中国（也有人加上墨西哥的），文明发源都是从农业开始。埃及有尼罗河，巴比伦有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印度有恒河，中国有黄河。其实中国不同于上述三国，因农业发展是靠水利灌溉，但中国农业的发展并非单靠一条河。此外，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均位于热带或亚热带，但中国则纬度、气候不同。再就面积言，埃及与巴比伦面积小，印度较大但比较单纯，而中国却幅员广大，此点亦与上述诸国有别。

再者，中国古代北方的农作物并非稻、麦，向来有所谓“五谷”，

即黍、稷、稻、粱、麦，再加上豆，则称“六谷”，再加上别的，则称“九谷”。农作物的品种，照理是由一处散布至各地，各种生物均然。所谓“生物一源”，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人如要研究中国最早的农作物，应根据历史来研究。

中国最早的农作物，应是黍与稷。最早产于北方的便是黍与稷，我国的《诗经》便已提到“黍”“稷”，又如甲骨文中提到最多的是“黍”字，讲到占卜年成好坏，就有“求黍”和“求黍年”等记录，但未见有“求麦”。因为黍贱易种，麦为贵品种而难生长，故商代人求丰年只求黍。这是历史材料，当我人研究此种甲骨文之史料时，应该产生问题，何以只求黍而不求麦。原因如上所说，因黍不值钱而易种，是商代人的主要农业作物，这证据可在《诗经》中找到，因“黍”“稷”两字很多。

我国古代农业发明者有后稷，有神农。“后”者，上帝也。“后”与“神”都是形容词，神农姓姜，后稷姓姬，此两人均在中国西部，何以不称“后稻”或“后麦”而称“后稷”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最古的农作物是稷。

甲骨文是盘庚后之文物，是我国可靠的史料。但后稷之史料是由传说而来，不一定可靠，此乃由推想而来的假说。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都是高地农作物，因为郑玄说：“高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sup>①</sup>今日北方以麦为主，种麦处即是种稻处，我国南方以稻为主，种稻处即种麦处，而稻、麦要的水分多，故在下田，黍、稷需要的水分少，故生在高地为宜。

今提出另一证据，束皙《补亡诗》云：“黍华陵巅，麦秀丘中。”“陵”是指山地、丘陵之义，即黍开花于山上。长江流域地

<sup>①</sup>《孝经》郑玄注。——编者注（本书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下文不再标示。）

区的山上可种稻，但在黄河流域的陕西地区山上则种麦。由上述可知，古代人多种高地山上的农作物，是旱地作物，证据是“舜耕历山，渔雷泽”<sup>①</sup>，这是说明在山上耕田，在水中捕鱼。

又一证明：后稷发明教人种田就在山西的稷山（并非陕西），自古就有此传说。

再一证明：神农一名“烈山氏”，意即神农氏发明农业，将山上的树木烧掉作肥料来种田，并非用水利灌溉来种田，所以又称为“烈山氏”。

又一证明为《吴越春秋》：“尧遭洪水……尧聘弃（即后稷）使教民山居，随地造区。”《吴越春秋》的作者是东汉时的浙江人，此处所谓“山居”，便是命人民住在山上种田。

由上述各种证明，可知古代人种田均在山坡上，种的是黍稷而非低地的稻麦。

## 二、古人居住于高处山地考

《易经》中云：“上古穴居而野处。”<sup>②</sup>证明古人住在山上。又《礼记·礼运篇》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窟”者，穴也；“营”者为一个个散布的窟窿。北方的太行山区，今日仍见到其半山区有此种穴居。故所谓“穴居”者，并非地下挖洞，而是在山上挖洞。又有《孟子》中云：“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sup>③</sup>

《诗·大雅·绵》中云：“陶复陶穴。”“陶”即挖空，“复”即“复”，

<sup>①</sup> 《史记·五帝本纪》。

<sup>②</sup> 《周易·系辞下》。

<sup>③</sup> 《孟子·滕文公下》。



总之穴居者即是“山居”，居住在山上是也。

山居与山耕同时，此时期之文化可称为“黍稷文化”，今日在北方仍有遗迹可见。黍是极简单的农作物，生长于高地，这种黍稷文化亦可称为“陵阪文化”。

中国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不在黄河流域，而是在其支流的渭水、泾水、汾水及洛水一带。其实这已是后期了，因中国最古的文化并非在水边，亦非在平原，而是在高原上，可称为“高原文化”，故并无西方人所谓的“在摇篮中孕育的文化”。埃及、巴比伦的花是在暖房中培育出来的，而中国的则是在山地上，经过日晒雨淋，并非花，而是松柏，即是花，也是梅、菊之类。

所谓“氏族”，中国古代均称“氏”，如神农氏、烈山氏、轩辕氏，直到春秋时代，尚有“氏”之称谓。“氏”者，《说文》云：“巴蜀名山岸胁之堆旁箸欲落堕者曰氏。”<sup>①</sup>“堆”即“阜”，石堆也，亦有称为山堆、山阜者。

“厶”或“𠂔”，即“岸”字，“山”表形，“干”表声而已。“氏”即“𠂔”，即山旁有一块东西好像要掉下来，故许慎说“氏”者“巴蜀名”，不一定对。与许慎同时之应劭说：“天水有大阪，名曰陇坻，其山堆旁著，崩落作声，闻数百里。”<sup>②</sup>“山堆”即山阜、山崖。《晋书地道记》云：“汉阳有大阪，曰陇坻，亦曰陇山。郡处其西，故曰陇西。其山堆旁崩，声闻数百里。”此处所说之“汉阳”即汉水北，“𠂔”即氏，“𠂔”即坻，“𠂔”是不明白而特意多加上去的。“氏”即坻，“𠂔”即阜。“阜”者，许慎说“秦谓陵阪曰坻”，是对的。故“氏”与“坻”实乃同一字，而许慎将之分成两个字，其实秦（陕西）、蜀（四

<sup>①</sup> 《说文解字》卷十二。

<sup>②</sup> 《汉书》注引应劭语。